

温厚平和 含蓄深沉

——曾巩诗歌论

喻进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温厚平和 含蓄深沉

——曾巩诗歌论

喻进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厚平和 含蓄深沉: 曾巩诗歌论 / 喻进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61 - 8744 - 9

I. ①温… II. ①喻… III. ①曾巩(1019 ~ 1083) —
宋诗—诗歌评论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986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耿晓明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75
字 数 377 千字
定 价 8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言

在对曾巩作为政治家、经学家、史学家、古文家、儒者的研究中，他作为醇儒的形象被广为接受。南宋理学家朱熹对曾巩赏爱有加，他从修身养性的角度，赞扬曾巩虽见道未深，然却平正。在唐宋诸古文家中，朱熹从对“道”的内涵的认定上，较为肯定曾巩。他亲自为曾巩撰写年谱并序曰：“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知公浅也！盖公文之高矣，自孟、韩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隐居通议》）他将曾文放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来把握，认为曾文之高直接韩、孟，无人堪匹，显然，朱熹对曾文的评价源于曾巩是一位深得儒学真传的儒者，而其文章则直接阐述了儒家的义理。由于朱熹在理学上的崇高地位，元、明、清三代对曾巩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受朱熹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曾巩被有意识地拔高、经典化，而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感体验，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面对人生困境时的心理情绪以及应对与思考，似乎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掩盖甚至埋没。

曾巩对儒家经典的依附感是非常强烈的，他热心对理论的解读源于他总是力求在经典中找到行为的依据、心灵的归属。这样，即使面对纷纭世事，总会在理论中认定自己的价值目标从而获得心理的平衡。不同于与他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散文家在接受儒学思想时又出入佛、道，曾巩没有融通佛、道。对于曾巩这样一位醇儒，其处世方式尤其体现出对儒家理论的自觉皈依。这种思想的纯净表现出确立儒家正统文化的强烈的责任意识。在曾巩看来，先王之道

是万世无弊的真理，他强调说：“夫经于天地人事，无不备者也”（《上欧阳舍人书》），“知今者莫若考古，知古者莫若师经。经者，万世之法也”（《黄河》）。出于这样的认识，佛道和诸子百家便毫无例外地被视作奇言怪论。在曾巩那里，儒家经典的真理性质无可置疑，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其法已行，其效已见，告后之人使取而则之，六经是也”（《为治论》）。因而，曾巩的诗文在对儒学作出自己的阐释时，自然也表达着由儒学而来的人生思考。对于曾巩这样一位争议颇大的“大家”，如果不深入地从作者留在世上的文本去研读、体会、思考，则难免对别人的看法莫衷一是。

在诗歌史上，曾巩的诗毁誉参半。陈师道认为“曾子固短于韵语”（《后山诗话》），秦观则云：“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东坡题跋》）与此相对，有些评价却非常高。后世有许多人为曾巩翻案，王士禛云：“渊才恨曾子固不能诗，今人以为口实。今观《类稿》中诸篇，亦荆公之亚，但天分微不及耳。”（《带经堂诗话》）贺裳云：“俗传曾子固不能诗，真妄语耳。”（《载酒堂诗话》）胡应麟说：“宋诸人诗掩于文者，宋经文、苏明允、曾子固、晁无咎……”（《诗薮》）对曾巩的诗歌评价成为一个公案，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的确，曾巩的诗歌既少刚健的豪气，也少横放的逸气，更没有浪漫的柔情。对于曾巩这位将人生过程始终连接在自我管束上的醇儒而言，他总是将人生的穷达、忧喜用道德自律进行化解，因此，很少表现出愤激难耐、骚动不安的心理状态。

曾巩的诗歌比其散文更能真切地反映其人生态度。比之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巩一生相对平淡，对于人生的穷达成败、升沉起落都没有显出大喜大悲，他以对道德的持守从容于俗世，整个人生显出一种淡静泊如的状态。其诗歌的主导风格正是他应世观物的情感态度和生命体验方式的外化，前期豪雄、沉郁，后期平静、节制、中和。这种情感体验以及表现这种体验的特点就是温厚平和、含蓄深沉。这使他很少走向偏执，而是适时地把握住自己的情感力度，表现出在任何人生情节中的淡定、平静。平和的诗歌容易使人感到淡

而无味，曾巩的诗歌没有韩愈的慷慨愤激，也没有柳宗元的孤愤满怀，更没有欧阳修的淋漓风致，亦与苏轼的豁达洒脱、王安石的劲健斩截异趣，他的诗歌的情感总体来说是温静平和的。这种平和的情感如果缺少一种理性，如果没有与诗人复杂微妙的内在心理特征结合起来，肯定会给人贫乏苍白的感受。而曾巩的诗歌情感虽然平和，但因为有了对人生磨难的深刻体验和理性的排解而在普泛意义上使人产生同情共感。

如果仅仅从曾巩作为政治家、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角度来解读，将仍然停留在对他的一个大平面的观照上。静水流深，作为一名诗人，透过其平实质朴的语言表象，我们会发现在平正的理念背后同样跃动着一颗投射着现实喜怒哀乐的心灵，展现着一名有经世抱负的文学家在平衡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心路历程，蕴含着生动丰富的人生内容。曾巩用自己的思考方式对儒学做出了合于自己人生态势的解读，也就是说，他的人生思考和行动轨迹基本对应着他对于儒学的思考，他的诗文则是他的思考轨迹在语言上的对象化，也是他生命形式的忠实展现。文学创作对于曾巩而言本来就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其中包含着曾巩对人生理想的设计，也包含着理想碰壁后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本文旨在通过对其文化品格和诗歌创作关系的分析，加强对其隐微深沉的内心世界的探索而不仅仅关注其对外在事功的追求，以期更真切地认识曾巩的文学世界与生命情境。全文分为上、中、下三编，具体包括如下内容：

上编分为三章，主要阐明曾巩的人生思考和处世方式，探讨曾巩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以对儒家之道的持守来超越现实困境。

第一章分析宋代士人的社会关怀和文化心态。曾巩文化品格的形成与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古主义运动有密切的关系。第二章分析曾巩的人格精神。包括理智平和的人生认识、立身修道的人格完善、自我调适的心理机制三个部分。第三章论述曾巩的人生态度及处世方式。包括坎坷的科场与艰难的仕途——曾巩的人生经历、忍耐退守——论曾巩的人生态度、平和勤谨——论曾巩的处世方式三个部分。

中编分为六章，在探讨曾巩诗歌的分期、内容、情感、形式、渊

源时注意结合宋代文人社会的整体特点以及曾巩本人的个性气质、人生经历、儒学修养等特点进行分析。

第一章结合曾巩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态度对其诗歌内容进行分析,分别对其反映忧国忧民、壮志难酬、娱情写物、亲情友情、风俗人情等内容的诗歌进行分析。第二章探讨曾巩诗歌特色形成的渊源,包括曾巩诗歌特色形成的背景及诗学主张两部分。第三章讨论曾巩诗歌的分期及依据,曾巩诗歌以通判越州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在三个方面都有变化:情感基调上从沉郁到平和的转变;创作目的上从偏重实用性到偏重文学性的转变;艺术风格上从豪壮郁勃到清深婉约的转变。第四章着重对咏史诗、咏物诗、山水诗、赠答送别诗等较少关注的诗体做详细解读。第五章探讨曾巩诗歌的主导风格,在诗思、意境、情感三个方面体现出平易、清静、平和的特征。第六章探讨曾巩诗歌的语言风格,从淡而深、平而畅、质而雅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下编在宋代“以文为诗”的大背景下对曾巩诗歌的特点与缺点进行探讨。总体来说,曾巩在诗歌创作上虽然谈不上是名家,但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对宋调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一章探讨宋代“以文为诗”这一诗歌潮流对曾巩诗歌创作的影响。包括诗歌散文化议论化的尝试、以文字为诗的语言特点、艺术技巧的尝试与发展三个方面。第二章论述“以文为诗”带来的艺术缺陷,包括以议论为诗带来的诗情枯淡、过度铺叙带来的诗情疲弱、篇章平衍无势带来的平淡无味三个方面。第三章探讨曾巩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主要从思想及创作手法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目 录

上 编

第一章 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	(3)
第一节 宋代文人社会的基本特征	(3)
第二节 宋代百年文治对宋代士人文化心态的塑造	(9)
第二章 曾巩的人格精神	(29)
第一节 理智平和的人生思考	(29)
第二节 修身守道的人格完善	(41)
第三节 善于调适的心理机制	(51)
第三章 忍耐退守的人生态度以及平和勤谨的处世方式	(66)
第一节 坎坷的科举之路与艰难的仕途——曾巩的人生经历	(66)
第二节 忍耐退守——曾巩的人生态度	(73)
第三节 平和勤谨——曾巩的处世方式	(77)

中 编

第四章 丰富而深广的诗歌内容	(89)
第一节 羌夷干戈今未解,天地疮痍谁能痊——民胞物与的忧患意识	(90)

第二节	出门榛棘不可行,终岁蒿藜尚谁恤——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真实展现	(96)
第三节	太守自吟还自笑,归来乘月尚流连——娱情写物,余事作诗人	(101)
第四节	共眠布被取温暖,同举菜羹甘淡薄——亲情友情的自然展示	(108)
第五节	麦粒收来品绝伦,葵花制出样争新——无意为之的风俗诗	(120)
第五章	曾巩诗歌特色形成的渊源	(129)
第一节	内敛自守的人格精神对诗歌特色的影响	(131)
第二节	学术思想对诗歌特色的影响	(135)
第三节	语言观对诗歌特色的影响	(137)
第四节	诗学主张对诗歌特色的影响	(141)
第六章	曾巩诗歌的分期及依据	(148)
第一节	从沉郁到平和:情感基调的转变	(151)
第二节	从实用性到文学性:创作目的的倾斜	(157)
第三节	从豪壮郁勃到清深婉约:艺术风格的转变	(161)
第七章	曾巩各体诗歌的特点	(170)
第一节	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咏史诗	(170)
第二节	比兴寄托的咏物诗	(177)
第三节	寄寓儒者情怀和道德意识的山水诗	(183)
第四节	人际往还的赠答送别诗	(196)
第八章	平易·清静·平和 ——论曾巩诗歌的主导风格	(207)
第一节	诗思之“平”	(208)
第二节	诗境之“清”	(212)

第三节 诗情之“和”	(218)
 第九章 淡而深·平而畅·质而雅	
——论曾巩诗歌的语言特征	(226)
第一节 淡而深	(227)
第二节 平而畅	(235)
第三节 质而雅	(241)
 下 编	
第十章 宋代“以文为诗”对曾巩诗歌创作的影响	(249)
第一节 诗歌散文化、议论化的尝试	(249)
第二节 以文字为诗的语言特点	(261)
第三节 艺术技巧的尝试与发展	(274)
 第十一章 “以文为诗”带来的艺术缺陷	(283)
第一节 以议论为诗带来的诗情枯淡	(284)
第二节 过度铺叙带来的诗情疲弱	(292)
第三节 篇章平衍无势带来的平淡无味	(300)
 第十二章 曾巩对韩愈诗歌的接受	(305)
第一节 曾巩与韩愈在思想上的相近	(305)
第二节 曾巩诗歌取法韩愈	(311)
 附录一 从王安石《明妃曲》及欧阳修、曾巩和诗的撰写看其 共性个性	(322)
附录二 曾巩诗文研究述略	(331)
参考文献	(341)
后记	(352)

上 编



第一章 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

第一节 宋代文人社会的基本特征

一 加强中央集权专制，制定崇文抑武的国策

宋太祖在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分裂的局面后，首先开始考虑如何收拾人心、整顿乾坤。太祖曾问宰相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灵涂地，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长久之计，其道何如？”^① 富弼称：“太宗求治之切，故诏群臣论事，欲面奏者，即时引对，此言路所以无壅也。”^② 这些记载显示了赵宋王朝通过反思历史、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的要求。基于这种思考，宋初统治者在首先军事上着手削夺武将的兵权，以收兵权为纲，空前强化君主专制。《宋史纪事本末》“收兵条”记胡一桂语：“太祖深思天下唐宋以来，生民涂炭，知所以处藩镇收兵权之道。既以从容杯酒之间，解石守信等兵权，复以后院之宴，罢王彦超等节镇，于是宿尉、藩镇不可容之痼疾，一朝而解矣！”^③ 其次是着重防备内部的叛乱，对外则采取守势。“太宗尝谓侍臣曰：‘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当合用心于此。”^④ 王夫之在《宋论》

①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页。

②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太宗致治”条，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3页。

③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收兵”条，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页。

④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中论宋朝衰弱之因时指出，由于宋军战斗力太差，导致其对外战争屡屡败绩，并认为“夫宋岂无果毅蹶驰之材，大可分阃而小堪奋击者乎？疑忌深而士不敢以才自见，恂恂秩秩，苟免弹射之风气已成，舍此一二宿将而固无人矣”^①，指出宋朝统治者对武将的猜忌与防备是导致宋朝兵力衰弱的主要原因。

宋代统治者鉴于晚唐五代军队横暴的惨痛经验，制定了贬抑武臣、重用文臣的基本国策。吕中对宋初统治者由“抑武”转向“崇文”的思路琢磨得很清楚：“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镇之专地也；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者，方镇之专兵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镇之继袭也。”将唐五代的混乱失国归罪于藩镇，对武人兵权的剥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吕中接着说：“太祖与赵普长虑却顾，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于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皆所以渐收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② 总之是采取种种手段抑制武人的兵权。与对武人的贬抑相对，宋初统治者对文臣则尤为优待。宋太祖所立的三条后世戒规中有一条便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说“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③ 太祖对儒学非常重视，据程俱记载：“国初既已削平僭乱，海寓为一。于是圣主恩与天下，涵泳休息，崇儒论道，以享太平之功。”^④ 太祖曾对左右说：“作宰相须用儒者。”^⑤ 此后宋朝历代君主都继承了崇文礼士、以文治国的大政方针。太宗希望“兴文教、抑武事”^⑥，初即位即有意于修文，曾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⑦ 此后真宗也继承前代皇帝

① 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页。

②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收兵”条，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11页。

③ 周辉著，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1“祖宗家法”，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5—18页。

④ 程俱：《麟台故事》卷3，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5页。

⑤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4页。

⑦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太宗致治”条，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4页。

的旨意，他说：“朕每念太祖、太宗丕变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有深旨。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庶警学者。”^① 真宗还在《劝学文》中通过许以名利来劝导士人向学：“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愁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② 鼓励读书人通过寒窗苦读而入仕做官。《宋史·文苑传》云：“自古垂统创业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也。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是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③ 说明了宋初六七十年奠定了文化繁荣的基础，并由此产生了“文士彬彬辈出”的结果。

二 重视文化图籍的整理，提倡儒学

宋朝统治者重视文化图籍的整理，是因为历代经典与史书中有着“以资治道”的至理名言。真宗皇帝的话表明了这种意图和目的：“上尝谓近臣曰：‘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编简，素所耽玩。古圣奥旨，有未晓处，不免废忘，昨置侍讲、侍读学士，自今令秘阁官，每夕具名闻奏，朕欲召见，得以访问。’其后每当直，或召对，多至二三鼓方退。上尝谓王旦等曰：‘经史之文，有国家之龟鉴，保邦治民之要，尽在是矣。然三代之后，典章制度，声明文物，参古今而适时用，莫若史、汉，学者不可不尽心焉。’”^④ 正因为如此，宋代诸位皇帝除对文人大量擢拔外，还集中士人编修《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大型丛书。真宗十分注意对图书的收集整理，他曾“召近臣观书龙图阁，曰：‘朕自幼至今，读经典其

①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②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③ 脱脱：《宋史·文苑传》卷439，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97页。

④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间，有听过数四。在东宫时，惟以聚书为急，其间亡逸者多方搜求，颇有所得，今已类成正本，除三馆秘阁外，又于后苑龙图阁各存一本。但恨校对未精，如青宫要纪、继体治民论，此一书二名，并列篇目。盖收书之初，务于数多，不嫌重复，甚无谓也。’景德四年三月，召近臣观书玉宸殿，即帝偃息之所，茵帟皆黄绢为之，无文采之饰，聚书八千余卷。”^① 对书籍的收集、整理与校讎直接提出了要求。

宋代诸帝还身体力行，爱好读书，大力提倡儒学。太祖喜读书，据记载：“太祖少亲戎事，性好艺文，即位未几召山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讲书。至今讲官所领阶衔，犹曰‘崇政殿说书’云。”^② 太祖建隆元年（960）“诏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像，自为赞，书于孔、颜坐端，令文臣分撰余赞，屡临视焉。尝谓侍臣曰：‘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贵文学。”^③ 太宗皇帝性喜读书，手不释卷，对读书深有体会。他曾“语宰相曰：‘史馆所修太平总类，自今日进三卷，朕常亲览。’宋琪曰：‘陛下好古不倦，观书为乐，然日览三卷，恐至罢倦。’帝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监戒，虽未能尽记其未闻未见之事，固已多矣。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好事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大凡读书，惟性所好，若其不好，读书亦不入。’”^④ 真宗皇帝请著名的儒士邢昺讲《尚书》等经典，“咸平辛丑至天禧辛酉二十一年之间，虽车辂巡封，遍举旷世阔典，其间讲席岁未尝辍”^⑤，“五年，讲春秋毕，邢昺曰：‘春秋一经，少有人听，多或中辍。’帝曰：‘勤学有益，最胜它事，且深资政理，无如经书。朕听政之暇，惟文史是乐，讲论经艺，以日系时，宁有倦耶？’”^⑥ 神宗皇帝尤喜读书，“嘉祐八年五月，始听讲于东宫，天资好学，寻绎访问，至日昃。内侍言，恐饥，当

①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②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③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太祖建隆以来诸政”条，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页。

④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⑤ 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3页。

⑥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食。上曰：‘听读方乐，岂觉饥耶？’”

宋代诸帝爱好文学，文艺修养极高。太宗皇帝“善飞白，其字大者方数尺，善书者皆伏其妙。又小草特工，语侍臣曰：‘朕君临天下，亦何事笔砚？但心好之，不能舍耳。……小草字学难究，飞白笔势难工，无亦恐自此废绝矣。’以数十轴藏于秘府”^①。除此之外，太宗还善隶、行、八分、篆等书法字体，又自做九弦琴、七弦阮。“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②据刘攽记载：“太宗好文，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常作诗赐之，累朝以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赐诗尤多，然不必尽上所自作。景祐初，赐诗落句云：‘寒儒逢景运，报德合如何？’论者谓质厚宏壮，真诏旨也。”^③这进一步促成了整个社会重文轻武的风气。

宋代崇文礼士、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带来了宋代文化的兴盛，这是宋代士人所面对的得天独厚的政治文化环境。早在南宋，朱熹已有“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之说；^④王国维云：“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⑤这些表述基本一致，都强调说明宋代文化的高度繁荣。

三 强化科举选拔制度，优待文人

科举制度强化了宋代文官政治。唐代的科举考试，取士少，当官难，据《宋史·王禹偁传》记载，仅太宗一朝进士一科即取近万名，而唐朝总共二百九十年间取进士才六千多人。^⑥宋朝不仅取士多，而且升迁极快，特别是进士高科出身的，不几年就可能位至宰辅。仁宗朝四十二年（1064），历任宰相几乎都是以儒学起家的进士。据统

①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②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③ 刘攽：《中山诗话》，载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4页。

④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0页。

⑤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载《静安文集续编》，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70页。

⑥ 脱脱：《宋史·王禹偁传》卷293，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793页。